

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 ——福澤諭吉「文明論」的邏輯構造

• 周頌倫

摘要：「脫亞入歐」意識是近代日本尤其是明治時期社會意識中佔統治地位的思潮。但是作為目前慣用語的「脫亞入歐」，其意涵既非先「脫亞」後「入歐」，亦非「脫亞」與「入歐」同步進行，而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近代日本在文明層面的「入歐」路線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而在政治層面的「脫亞」路線，則是其對亞洲侵略意識的反語表達。幕末明初的危機意識不但是藩士提出各種「經世秘策」的源頭，更是明治時期思想家福澤諭吉探索「文明論」對策的動因。本文指出，通過考察明治前期的社會變化，福澤諭證了日本在文明層面確立「入歐」路線的合理性。隨後，由於明治政府的首腦在地理位置、人種與宗教和文明水平上形成了對外關係三重論，福澤也提出了以「朝鮮盟主論」為核心的「東洋盟主論」，日本的自我定位進入轉型期。在歷經「壬午兵變」、「甲申政變」以及中法戰爭後，福澤愈來愈意識到作為「他者」的中國是日本引領東亞「文明化」的巨大障礙，於是日本在政治層面的「脫亞」意識隨即登場。從近代日本文明與政治的發展脈絡上看，捨「東」而趨「西」是近代以來日本文明的歸宿，而在此過程中，侵略意識也隨之萌發。

關鍵詞：「脫亞入歐」 文明「入歐」 政治「脫亞」 福澤諭吉 「東洋盟主論」

斷然中止與中國、朝鮮等亞洲古老國家的傳統關係，加入歐美近代文明陣營，並與文明國家共進退，即所謂的「脫亞入歐」意識，是近代尤其是明治時期日本社會意識中佔統治地位的思潮。實際上，作為目前慣用語的「脫亞入歐」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入歐」即擺脫亞洲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日本的危機意識研究」(12BSS008)的階段性成果。

的遲滯發展狀態，學習和追趕西方國家的文明成果。這是日本面對世界文明浪潮的衝擊所必然選擇的文明路線，在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有其進步的一面。「脫亞」即在追趕歐美列強先進文明的同時脫離亞洲，並參與西方列強對亞洲的侵略。這一侵略意識是日本在追逐近代化的過程中全盤吸納近代國際政治原理的負面因素而逐漸形成的，有其反動的一面。可以說，日本政治層面的「脫亞」意識位於文明層面的「入歐」路線與政治「盟主」意識的交合點，生成了日本近代「文明論」的邏輯構造。

在探究「入歐」路線與「脫亞」意識的演變過程中，明治時期著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充任着發明者的角色。雖然人們都認為福澤是近代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啟蒙主義者，但在同一個「啟蒙」字面之下卻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兩種思想路徑——文明啟蒙與侵略啟蒙。這一正一反的兩個側面經常處於對峙狀態，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但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卻是後者。通過向西方學習和移植而獲得的文明與進步，從屬並服務於對鄰國的侵略，是「脫亞入歐」意識的本質特徵。其要害是，「入歐」意識內含的對進步的嚮往，很快被「脫亞」路線所內涵的侵略意識掩蓋，最後竟淪落為反動的工具。

一 幕末明初的危機意識與福澤諭吉的「文明論」

(一) 幕末明初的危機意識

就其政治特徵而言，德川幕藩體制時代依靠儒學秩序名分觀念和石數制度維繫等級封建制，再通過鎖國政策為內部等級秩序提供一個外部保護層。然而，到了德川時代中後期，由於商品經濟的侵滲和列強船艦連續不斷地航行於日本列島沿岸，幕藩體制的內外政策已很難再執行下去，深刻的危機正在形成。

內政外交的危機迫使人們思索擺脫危機之策，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薰陶的蘭學者首先發難。在對近代科學的新奇感和求知欲驅使下，他們認為維護幕藩體制的傳統儒家倫理觀，「必竟皆空洞無稽之識」，而西方近世之說，「窮天地之精微，極宇宙之要妙」^①。儒學在解釋政治與經濟現象時所表現的蒼白無力，使他們以一種虔誠的熱情，期待放棄鎖國政策，全面接納西方文明。這種置本國具體國情及傳統心理定勢於不顧的態度，顯然帶有強烈空想色彩。然而，這種心態對於幕藩體制及漢學傳統，具有不容忽視的衝擊作用。

如果將蘭學者的想法歸納為「被動開國論」的話，那麼在廢止鎖國政策的同時，收回為鎖國所放棄的日本國家對外部世界的要求，在向外開放海禁的同時，實現日本開拓海外的政治主張，則可以理解為「積極開國論」。持這種論點的學者，早期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等，後期有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吉田松陰等。這些被稱為國權主義者的學者，將尋求擺脫日本國

家和民族所面臨的內外危機視為天職。他們一方面認為被殖民的遭遇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又深知拒絕接受合理的新事物是不明智的，而且也無從拒絕。佐藤信淵在《垂統秘錄》中，提出建設一個發展本國產業、從事海外貿易和殖民的日本新國家的設想^②。1853年美國佩里（Matthew C. Perry）將軍來航後，在鎖國與開國的大論戰中，橫井小楠認為：「開可通而鎖不可守，進可征而退不可攘」^③，吉田松陰則更簡明地表述為：「由朝鮮、滿洲奪取土地補償失之於俄易之貿易損失。」^④

在明治政府中掌握權力的革新派人士，大多數人都是洋學者或國權主義者的學生，其中一些關鍵人物如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等人，直接就是吉田松陰的學生。他們發動並領導維新運動，其目的是打倒幕府統治，爭取國內解放，擺脫幕府對列強的「屈從」地位，實現民族獨立。

（二）福澤諭吉訪美與「文明論」三重奏

福澤諭吉一般被視為學者和思想家。但是，通讀《福翁自傳》，很難得到福澤作為一個政治學者而投入社會活動的印象。事實上，福澤一生從事的事務，就是一個專門為國家政策設計方向的「政治診斷醫」^⑤。福澤二十五歲時受幕府派遣，搭乘軍艦「咸臨丸」，隨幕府使團訪問美國。據長尾政憲考察，福澤訪美時的公開身份是使團的翻譯，而實際上卻還擔負着「探察實務」的責任^⑥。出訪期間，福澤隨時隨地將見聞所感記錄下來，寫在一個叫做《西航手帳》的筆記本裏。日本學者松澤弘陽最早接觸並對此筆記本進行了分析，認為它是「以福澤的西洋見聞為基礎，再加之關於西洋的學習」^⑦，真實地反映了福澤對西洋事物最初的認識。

由此，我們基本能夠斷定，福澤諭吉出國訪察之後奠定的思想基底，是對西方國家體系的全盤接受。對內，這一體系在政治上強調對應國際法，在經濟上則由自由貿易主義向相互保護主義轉變；對外，則強調擴張合理原則與要求後進國對自己從屬的原則。毫無疑問，西方世界的這種內外原則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正義缺損的矛盾。怎樣才能填平這一隔閡呢？最普遍的做法是通過「文明」與「野蠻」的區分，來為這一極端無視公正平等原則的體系張目。「文明國」之間有其習慣性默契；所謂「文明」與「野蠻」之間，亦有其公認的處置慣例。而所謂「文明」在這一體系製造者的眼中，亦恰如其分地履行着屬於自己的內外區分的機能，是由外入內的階梯。為此，福澤自1866年起直至1901年去世，始終「將長期無知識狀態中睡眠的無氣力愚民，改造成擔當洋洋新社會建設的國民，將鎖國的東洋小國，變化過渡為充滿活力的獨立國」，作為自己一生的「作業」^⑧。

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均成書於1866至1867年間，構成了其「文明論」的三重奏。其中，《西洋事情》着力於全面介紹西方物質文化，奠定了福澤作為一名洋學者的名聲，但書中尚沒有全面系統地展現關於「文明論」的主張^⑨。

眾所周知，福澤諭吉為了宣傳天賦人權，在《勸學篇》的開篇以「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給當時人們以衝擊性的警示，並長久流傳，甚至進入了中小學課本。通覽全篇，福澤貫徹的核心思想，是由「一身獨立」而臻於「一國獨立」的境界。很明顯，不論是時代變遷所致，還是福澤本人的關心所致，這同西方啟蒙主義的最終指向是有差異的。後進國家在採納西方文明作為近代化樣本時是被動的，但在進行吸納甚麼或拋棄甚麼的選擇時卻是主動的。幕末政治的核心問題，並不是先進生產力受壓制而導致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是面對西方的外壓，國家要不要改革和由誰來領導改革。無論是倒幕勢力抑或幕府勢力，在如何排解外壓、保持民族獨立的問題上，並未見有大的矛盾衝突^⑩。簡言之，反對幕府和忠誠於民族（國家）並不矛盾。

西方文明初傳日本的魅力是令人窒息的。福澤諭吉將與傳統的「斷絕」和對歐美的「親近感」，作為了「脫卻過去的尺度」^⑪。繼《勸學篇》之後，他又完成了堪稱巔峰之作的《文明論概略》。在此書中，他期待全體國民變革精神，對《勸學篇》中有關文明與智德的闡述進行了更深入的論證。但我們同時亦必須指出，由自由民權運動帶來的社會不安和動蕩使福澤對政情的發展有些擔憂，於是他作為「診斷醫」開出了藥方。

《文明論概略》的公刊雖可謂近代日本啟蒙主義登峰造極的象徵，然而在筆者看來，亦是福澤諭吉「文明論」破綻畢露的表現，因為他在其中闡發了下述思想：

其一，福澤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國體」、「政統」和「血統」概念及三者間的關係。國體彷彿一個人的身體，血統彷彿一個人的眼睛，政統時常處於變化狀態中，日本人當前的唯一任務就是保衛國體；其二，從中日歷史比較入手，福澤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直接批評，這些批評散見於全書。福澤認為只有一個因素（專制神權）的中國，思想貧瘠而單純，而擁有兩個因素（神權＋武力）的日本，思想豐富而複雜，此乃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不幸；其三，文明有先進與落後之分，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壓制。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只有兩類：一是貿易競爭，一是開戰。在福澤看來，只有伸張本國權利，發揚本國榮譽的人，才是具備愛國精神的人^⑫。

將以上三點同《勸學篇》「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相對照，不難看到，其與純粹意義的「文明論」已經相去甚遠。首先，在國體、政統和血統的論述中，福澤諭吉已經如明治初年啟蒙主義者加藤弘之一般，向國家與政府實為一體的官僚型國家觀倒退，力主保衛國體；其次，對中國儒學乃「虛學」的批評，表明他對中國文明、文化和政治的全面批評開始升級；最後，福澤不僅原封不動地套用了「優勝劣敗」的庸俗進化論觀點，還暗示着日本文明一旦先進起來就可以壓制其他遲滯文明。以「診斷醫」自詡的福澤所診斷的對象是日本，為之看病，為之服務。這正是他的「文明論」的破綻，更是他的「文明論」命定的歸宿。在福澤純粹的文明啟蒙逐漸褪色的同時，其實用主義型侵略啟蒙的思想卻在加強。

二 文明層面「入歐」路線的確立與明治前期的社會變化

(一) 文明層面「入歐」路線的確立

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下層武士和部分民眾不僅期待、而且堅信政府會果斷地將列強攘除出國門，以恢復神的後裔治理國家的「尊嚴」，但維新領袖卻斷然放棄了「攘夷」方針。明治政府確信：各國恪守「中立」立場是維新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日本的國際地位需要列強的承認；更為重要的是要建設一個新國家，列強所擁有的，正是日本所缺乏的，因此政府的基本方針已經放棄了攘夷論，宣布承認幕府所締結的所有條約繼續有效^⑬。

凡此種種，表明新政府在民族獨立方面僅僅改變幕府對列強的「屈從」為「從屬」而已，與此前所標榜的「萬國對峙」、「擴張國權」存有尖銳矛盾。政府企圖通過修改不平等條約來解決這一矛盾，所以明治新政府在1871年派出了龐大的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最大收穫有以下三點：一、耳聞目睹並親身感受了歐美各國文明的壓倒性優勢與亞洲遲滯性發展之間的差距；二、明確意識到日本必須通過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加強國民教育，迅速地輸入西方文明，實現富國強兵和完成集權體制，為修改條約準備條件；三、在外交政策的指導理論上，開始全盤接受了德國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以鐵血政策為特徵的外交信念，確信弱肉可以強食。

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的第一動機，本是修改條約，但由於各國缺乏誠意，所以修改條約從一開始就被擱置起來。但是通過考察，他們懂得了修改條約的前提是「從小國走向大國」，像英國那樣發展工業，像德國那樣講求武力。所以使節團出訪的重要結果在於：「見識了歐美文明的壓倒性優越和亞細亞的落後，脫亞入歐的基本路線得以確認」^⑭，政府從1873年以後正式確定了一條在文明層面「入歐」的路線。此後一段時期，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政界軍界實力人物為代表，「入歐」意識首先在明治政府主要成員這一最高層次中形成，明治政府前期的內政外交都以這條路線為核心而展開。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明治政府在確立「入歐」路線的同時，還在推行「侵亞」政策。如果說1868年12月新政府在得到列強的承認以後，參議木戶孝允立即提出「征韓論」，謀圖憑恃對外緊張來達成國內穩定，還只是木戶及大村益次郎等政府要員個人的意見，那麼1874年後出兵台灣、製造「江華島事件」、將歸屬未明的琉球劃歸日本國沖繩縣等政府對外行為，則不折不扣地具備國家政策的特徵^⑮。而且，這些對外行為都是針對清政府的。但總體來說，日本明治政府在蔑視「老大帝國」清廷的同時，採取依憑力量決定一切的外交哲學，奉行在陸海軍力量沒有充實之前避免與清廷正面衝突的外交策略。因而，此時「脫亞」意識尚未明確地顯露。

(二) 明治前期社會變化

1885年是明治十八年。經過十八年的不懈努力，日本以西歐強國為模範，在近代化的路途上大步疾進，取得的成果令人矚目。在多數日本通史著

作中，著述者常將產業發展、教育振興、憲法制訂等作為文明化的代表性成果；然而，筆者在這裏更想強調的是體現出綜合性進步的社會變化。

司馬遼太郎曾說過，明治政府雖然從幕府手中奪得了政權，但在成立之初對於如何建設一個新國家胸中並無藍圖。從1871年3月起，政府在英國募集了百萬英鎊公債，開始修建從橫濱到新橋間的鐵路。翌年，明治天皇在新橋車站出席了鐵路開業儀式。天皇身着朝袍，神情虔誠而又難掩悅色，站在月台地毯上，向蒼天訴告祈禱。身後簇擁着民部省的官員和英國技師，而一列待發的火車正急不可待地準備駛向橫濱^⑥。列車在橫濱與新橋間一日九往復，每次用時53分鐘。據營業統計，當時便有很多人利用這趟列車往返於橫濱與東京之間。上下車的人流之中，雖仍可見佩刀的武士與身着和服的女性，但開始出現穿禮服和西裝的男女，女性手挽手袋，男性手執手杖，還有軍人和外國人穿梭其間^⑦。熙熙攘攘的場景，無言地訴說着東京的人們正在逐步脫離江戶時代悠閒自在的生活。運行的列車將流動與遷徙、希望與機遇、速度與效率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展示在人們面前。

1877年8月，第一屆全國勸業博覽會在上野舉行。巨大的時鐘和高達4米的水柱，令與會者歎為觀止。其中，農業館和機械館最受人們關注。在102天的會期中，展出品計80,000件，參觀者達456,000人^⑧。同年，作為近代都市建設首批項目的煉瓦街（紅磚建築）建設工程也告完成（建築歐式風格的煉瓦街計劃在1873年確定）。從新橋到銀座，街道寬15間（1間＝1.818米），兩側人行橫道分別佔3.5間（日本最早的人車分流街道），種植有松、櫻、楓等街樹。街道兩側建築全為歐式風格的二三層樓房，店鋪、報社和出版社鱗次櫛比。外務省、司法省、陸軍省、參謀本部、海軍省和後來確定的國會及首相官邸等官廳，以及外交場所的鹿鳴館和博覽會場，全部可以通過此歐風街道方便聯絡。服部撫松在《東京新繁昌記》中自得地寫道：「二層高樓陸續綿延，巍峨聳立蒼穹，石屋模仿英京倫敦，街路模仿法京巴黎，難道還要越過萬里波濤去他們的國都麼？」^⑨

近代都市的規劃和建築，反映了政府刻意模仿西歐文明而首先從外觀力圖改變舊有形象的主觀願望，其中充斥着追逐近代化的焦慮心情。從以後的歷史進程反省，這種焦慮和急躁與後來的近代化歷程是相始終的。但是，近代日本對文明和進步發展的追求與嚮往，也並不是完全專注於硬性的外飾而不關心軟性的內在改進。1899年《明治憲法》固然是天皇「賜給」的，但是社會各階層都自發地參與到憲法制訂之中。被稱為「五日市憲法」的草案是山村小學教員千葉卓三郎擬制的，定稿之後並無機會送呈政府要員，可能只在其組織的讀書會朗誦過。明治維新百年紀念之時，日本學者色川大吉從事民間調查時在一個山村的小倉房中發現了這部塵封八十餘年的手寫憲法草稿^⑩。

明治維新後，日本人覺悟到以前日本的力量不足以與西洋列國相對抗，便轉而舉全國之力理解、吸收西洋的成果，自上而下地向全體國民灌輸，迅速地取得明顯成效。中日甲午戰爭時清朝軍隊所露呈的頹勢，一方面說明了

兩國在文明層面上的差距，另一方面表明了日本政府採取文明「入歐」路線的正確性與合理性。

三 明治政府對外關係三重論與福澤諭吉的「東洋盟主論」

(一) 明治政府對外關係三重論

1880年11月，山縣有朋向天皇呈上〈鄰邦兵備略〉，他在序文中說：「夫鄰邦兵備之強，為援則可以喜，開釁則可以懼，若鄰邦疲憊衰頹而成歐洲各國之餌食，唇齒之勢，我亦因此而受其壓迫，夫堤防不堪周密，一旦罅隙驟起潰裂四出，以至不可復救，北地強俄自不待言，西鄰果得其強，我與朝鮮介於其間猶如春秋鄭衛之於晉楚，不勝憂慮。」^②〈鄰邦兵備略〉的真意，自然是將清廷作為假想敵，摸清對方的軍備情況，以整頓足以與清廷匹敵的軍事力量。但其中亦包含着在歐美列強的壓力下，日清互為援助以對抗北邊俄國的威脅的想法。這說明了明治官僚在對外政策的考慮方面，是適應當時國際關係中錯綜複雜的局面的，還沒有簡單到要以清廷一國為敵手，急欲勝之而後快的程度。

同樣的想法，在伊藤博文那裏亦是一致的。1882年正在歐洲進行憲法調查的伊藤在談到歐美列強對日本的態度時說：「若論東西二洋的交涉，……歐洲所謂文明道德者，悉皆耶穌教內之事，若推定異教之人則誠意全無。」^③可見伊藤內心對西洋是不夠信任的。

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是明治時期最具政治指導力的兩位政治領袖，他們在推進歐化政策的同時，對西洋和俄國一直持有強烈的警戒和對抗心理，這主要是出自激化日清矛盾可能會招致列強干涉的擔心。這種認識，即便在「壬午兵變」發生之後，也還沒有完全改變。從以上論調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對外政策中存在着三重性判斷標準：第一，在「文明與非文明」這一標準前，日本認為自己屬於歐美一方，甚至遠遠強過歐洲的後進國，屬於文明一方；第二，在「人種與宗教」這一標準前，日本還沒有將自己劃入西洋一側，還不敢完全放心地說歐美列強不會再侵略自己；第三，以「西洋與東洋」來區別世界時，日本認為自己雖然還屬於東洋一方，但是屬於東洋的文明國，因此將圍繞朝鮮問題形成的東洋內部的國際紛爭，硬性劃入「文明與非文明」的對抗這一組矛盾體之中。

對外關係三重論在明治初年構成了日本制訂對外政策的思想基調。日本的政治精英希望自己的國家能迅速地成為東洋的文明國，並希冀西洋諸國以文明國的目光看待自己。同時，他們也對西洋列強抱有強烈的警戒和不信任，但為了達到修改條約的目的，則必須推進歐化政策。他們意識到，與清廷的對立可能會導致戰爭，但鄰國實行改革加強力量則可能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實力。在東洋與西洋這層關係上，可能使西洋列強在實行其亞洲殖民政策時會有所顧忌。無論是對東洋還是對西洋，富國強兵總是第一要

義。在一段時期內，明治政府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確定其對外政策的基調。對於這種對外關係三重論，福澤諭吉是怎樣看待的呢？

(二)「東洋盟主論」的核心：「朝鮮盟主論」

大量文獻表明，1870年代以後，就對外政策政略發表議論是明治知識人最熱衷的話題。1881年9月，福澤諭吉發表〈時事小言〉一文，隱含在《文明論概略》中的國權伸張的思想開始踏入脫韁之途，被視作其「文明論」思想的分水嶺之作。文中闡述了他對亞細亞，特別是中國政策的觀點。福澤認為：西洋主導的文明化就是亞洲的殖民地化；日本主導的文明化，就是亞洲的獨立化。因為日本自身也是被西洋壓迫者。福澤說：「至於立論的主義，在於嚴我武備，伸張國權。武備不止於獨守日本一國，兼而保護東洋諸國，治亂而為其首，根據其目的，規模亦必遠大。」²³〈時事小言〉是福澤在發表〈脫亞論〉（1885年3月16日）之前關於日本對外政略最重要的文章。在人種與宗教這層關係上，福澤依然承認東洋與西洋的差別。福澤將這種差別當作了警戒西洋的理由，同時亦當作了「保護」東洋的正當性依據。「東洋盟主論」就是福澤這類論者的對外主張。

1882年3月11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以〈論朝鮮交際〉為題發表社論，稱「亞細亞全洲以協心同力防衛西洋人的侵凌」²⁴，主張通過對朝鮮施加軍事壓力來構築日本在朝鮮遠遠超出各國勢力的優勢地位。此文是福澤關於朝鮮政略的最重要的文章，在〈時事小言〉發表半年之後面世。若將前後相隔半年發表的這兩篇文章進行比較，前文涉及內政外交諸多事項，是在宏觀角度展開論述的；而後文則是具體地提出了經略朝鮮的對策。更重要的是，福澤在後文中明確地將中國和朝鮮區別開來對待：「擔憂支那的形勢，又干涉朝鮮的國事。」²⁵可見在福澤心目中，即便「東洋盟主論」包含中國在內，但中、朝兩國在其內的地位亦是不同的——在文明與非文明問題上，「以武力保護之，以文明誘導之，務必以我為榜樣進入文明之列，不得已場合，可以力量脅迫其進步」²⁶，對朝鮮可以武力干涉之意已披瀝無遺；而對中國則是「擔憂」，還沒有以文明與否決定具體政策，似乎還保留着人種與宗教上的「同屬」感。

由此，福澤諭吉的這兩篇文章及同時期散見在《時事新報》的社論中關於「東洋盟主論」的許多闡述，同明治政府要員所持的對外關係三重論，在理念上是極其接近的。可以說，明治維新之後不久，日本自以為已經文明化，故應當在東亞擔當領袖，這是當時日本社會上下一致的看法。

1882年7月末發生朝鮮壬午兵變。7月31日，福澤諭吉主張大規模派遣陸海軍進駐朝鮮，一旦中國介入則立即決戰，似乎用「日中決戰論」替代了「東洋盟主論」。但他在8月1日《時事新報》的社論中又說：「朝鮮人心不足憑恃，必須以兵力維持眼下之約定。」²⁷對朝鮮政略仍然堅持「東洋盟主論」，亦是明白無誤的。「朝鮮盟主論」的登場，濃縮着近代日本人「惡」用西方政治的全部心機。

四 作為「他者」的中國與政治層面「脫亞」意識的登場

(一) 作為「他者」的中國對日本「東洋盟主論」的壓力

由上看見，福澤諭吉對朝鮮、對中國所指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他在〈時事小言〉一文中就表示：中國並非「近鄰合璧之糟板屋」，而是「石屋」^⑳。福澤在1882年11月發表的〈兵論〉中認為：「清國近年來實施陸海軍改進，惟其一局部而言，其實數已幾等同我日本國陸海軍，而其海軍則多於我國近一倍。」^㉑李鴻章所主導的洋務運動導致清國軍備實力的增強，是福澤所密切關注的。在福澤看來，想成為「盟主」的日本對清廷在軍事上並沒有甚麼優勢可言，日本並沒有讓清廷心悅誠服的實力資本，故他只對朝鮮做一些能夠體現其「盟主」願望的具體論策，而對中國則從來不作具體政策的討論。因為隱含着對中國軍事實力的擔心和警戒，福澤對中國的「東洋盟主論」是有條件的：即中國在軍事力量並不居日本之下的情況下仍然感佩日本文明開化之日新月異；否則，對中國的「東洋盟主論」則必向「日中決戰論」轉換。

在壬午兵變一事上，中國在朝鮮問題上對日本表示了不能輕易妥協或就範的外交姿態。事態表明：「朝鮮盟主論」會因為中國的不合作或者反對而成泡影。「他者」中國橫互在日本與朝鮮之間，直接威脅「朝鮮盟主論」的兌現。對此，福澤諭吉表示：「不能不說我東洋之政略已為支那人所損害。」^㉒曾經贊成內治優先、反對軍備擴張的福澤，因為以「朝鮮盟主論」為核心的「東洋盟主論」遭遇困難，而後悔當初所採取的立場。這表明福澤已經從文明啟蒙者開始向國權擴張者轉變。

中國軍事力量的加強會威脅到日本作為東洋盟主的地位，是兌現「東洋盟主論」的第一障礙，因此而推定在文明開化方面日本或許也不會一直對中國保持優勢，這是「東洋盟主論」的又一困難。1884年3月5日，福澤諭吉以〈期望日本之名不被支那所遮蔽〉為題在《時事新報》發表社論，其中談到中法之間的對立陷入膠着狀態，中國已經在軍事方面達成了西歐化。如果中國繼續加強其「文明化」的程度，成為遠在日本之上的「光耀國度」，那麼「日本之名就會被支那所遮蔽」，這會讓「日本人落膽失望」^㉓。

這篇社論是以中法緊張、衝突為背景撰寫的，道出了福澤諭吉設計「東洋盟主論」所能夠適用或成立的限度。確實如上文所述，這種主張與其說是以中國的「文明化」為目標，不如說是以中國為對手的。如果認識到中國的「文明化」不是通過日本的「指導」，而是通過與法國的緊張和對抗得以推行的話，那麼日本不僅連東洋盟主的資格都喪失，甚至在稱謂上也不能以「東洋盟主」而自居。福澤的「東洋盟主論」，實際目標就是追逐和實現在朝鮮的盟主地位。如果中國的文明化是借助法國為媒介而得以實現，那麼前述的對外關係三重論將完全失去意義，中國會當然地成為日本角逐東洋的對手。

既然由日本來主導中國的「文明化」已不可能，以法國為媒介推進的中國「文明化」對日本反而是威脅，更主要的是朝鮮的「文明化」明顯地遇到了中國

的「干擾」，於是祈望由法國來征服中國反而成了福澤諭吉的心願。如果中國戰敗，其在朝鮮問題上的意欲及能力就會被削弱。由於希望法國打敗中國的心理作祟，1884年9月4日，福澤在《時事新報》發表了題為〈輔車唇齒之古諺不足憑恃〉的社論。他說：「確定擔心唯西洋諸國，交際亦唯西洋諸國之決心，乃今日我國民之心事也。」³²可見，該文在〈脫亞論〉正式發表的半年之前，已經將「脫亞論」的主旨基本展示給了當時的日本社會。

由此，當1884年12月「甲申政變」事發後，福澤諭吉已完全摒棄了文人的沉篤與風雅，斬釘截鐵地表示：「必須設法斷然訴諸兵力以終結此等局面。」³³隨着中日之間時局的變化，他已經明白無誤地主張模仿西方條約體系的對外原則來處置中日關係。

（二）政治層面「脫亞」意識的登場

明治維新後日本文明開化之際，福澤諭吉大力聲張文明之為何物，從事精神啟蒙；對外關係緊張時，福澤又不失時機地談論亞洲觀點，主張對中國開戰。再三聲稱自己一生不想做官的福澤，總是能夠急政治之所急，發表讓政府喜歡的言論。實際上，就在福澤將自己熱衷的話題由「對內啟蒙」轉向「對外侵略」時，他的立論也由主張「民情一新」轉向「官民同調」³⁴。

1884年12月4日，朝鮮發生了甲申政變，日本向朝鮮擴張的嘗試再遭挫折。12月26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的社論中將中國、朝鮮喻為「一體雙頭之怪獸」³⁵，這再清楚不過地宣布曾經在福澤之輩心中構建的「東洋盟主論」已經被完全放棄，並為「政治脫亞論」所代替。

甲申政變之後，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似已不可避免。1885年2月，伊藤博文前赴天津與李鴻章交涉，局勢一度緩和。但福澤諭吉不滿政府的做法，於3月16日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題為〈脫亞論〉的短文，其中心意思是：第一，西洋文明之傳播，已經蔚為風潮；第二，在此風潮流行之際，日本國樹立新政府，不僅脫卻日本舊俗，且在亞洲創出一個新的軸心，其主義所在唯奉脫亞二字；第三，仍在恪守舊俗的朝鮮與中國不出數年必為列國所分割；第四，中、朝、日三國地理相接，但文明國卻容易用評價中朝兩國的基準評價日本。因此，「為今之謀，不可再有等待鄰國文明共興亞細亞之猶豫，不如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共進退。」³⁶

這樣的想法和主張，福澤諭吉在此文之前發表的各篇文章中，都有更為詳盡深入的分析闡述。應該說，洋溢精神啟蒙華彩的文明思想、主張對中國直接開戰的兇相、對歐洲列強徹底分割中國的期盼，以及對天皇神聖的信仰，都採用了內斂的扮相，濃縮為一舉剪斷與東亞諸國文化因緣的渴求，凝聚在〈脫亞論〉一文之中。

〈脫亞論〉的一個特點在於極端地蔑視中國和朝鮮兩國「古來之政教風俗」，即蔑視聖德太子曾頂禮膜拜的大陸文化，「脫亞」即「脫離儒教」³⁷。這種蔑視感比較「朝鮮干涉論」和「對中國作戰論」來說，其意味要複雜許多。〈脫亞論〉不僅含有對清朝中國和李朝朝鮮遲滯和愚鈍的失望和失意，更是一份絕

交宣言和開戰宣言，是向日本社會民眾鼓吹對中國作戰。〈脫亞論〉全文，字裏行間充滿着對西洋國的佞言媚語；對中國的憎恨中也隱含着對清廷正在增加海軍的警惕和擔心。對戰爭本身，福澤在1894年7月29日《時事新報》的社論明確指出「日清戰爭乃文明與野蠻之戰」³⁸，〈脫亞論〉中沒有點破的意味此時終於透紙而出。

（三）〈脫亞論〉在二戰前日本的影響力

從外交層面上而言，「脫亞」、「入歐」本來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自主選擇。但由於這種主張更多地意味着文明和文化層面的選擇，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成為學者熱衷的話題。就〈脫亞論〉的內容抑或其宗旨而言，很難說福澤諭吉在文中直接鼓吹發動侵略戰爭。事實上，在此文章發表後的數十年間，它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大正年間編輯出版的《福澤全集》和戰後初期出版的《福澤諭吉選集》，都沒有將〈脫亞論〉一文收錄其中。福澤「文明論」的顯著特點在於：力圖將近代日本「納入西方文明發展軌道」，卻又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為其歸宿」³⁹。直至1950年代以後，戰敗的事實和戰後重建時期諸般痛苦而冷峻的歷練促使日本人對脫亞型的近代化歷史及其思想源流進行反省時，〈脫亞論〉一文才突然被人從故紙堆中檢出並迅速受到關注，「脫亞入歐」才成為思想界的流行語。

當代日本學者遠山茂樹等在追溯日本近代化遭受挫折的根源時，指出其要害是「脫亞入歐」，認為福澤諭吉「在走向日清戰爭的路途中，也起着啟蒙般的作用」⁴⁰。這種觀點雖然沒有將文明意義上的「入歐」和政治意義上的「脫亞」加以區分，忽視或過低評價了福澤及其同時代許多文化人對清朝中國和李朝朝鮮認不清世界大勢、恪守舊體制不思進取而產生的失望感，以及追求文明開化的強烈欲望的正當性，但對〈脫亞論〉一文的思想批判仍然是具備充足理由的。

在關於福澤諭吉思想的研究史上，當代日本學者安川壽之輔的結論有兩個特別引人注目之處：其一，福澤的思想變遷軌迹經歷了從最初對西方人文精神的醉迷，向「對外強硬論」、「皇軍論」、「戰爭支援論」，乃至「皇室論」連續移動，最終的結論乃是「決不可將日本皇室與西洋王室同一視之。我皇室萬世一系，寶祚之盛大天壤無有邊際」⁴¹；其二，在與同時代的「文明論」者田中正造的思想比較中，相對於田中的「人性至上論」，福澤將中國人直接斥之為「乞食」和「豚」，完全置「人上人」、「人下人」的自創格言於雲外⁴²。在關於近代文明核心價值的問題上，福澤對合理、正義、人權的粗暴背叛，令人乍舌。

五 結語：「文明入歐」與「東洋盟主」 ——近代以來日本文明的歸宿？

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的日本近代化運動，在文明的追求和獲取方面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急躁，在文化的取捨方面充滿着對中國、朝鮮的蔑視，所

以在外交戰略方面整體性模仿歐美的亞洲政策，以急切得到文明成果，用之於軍事、經濟、外交諸方面。因為在文化觀念上對中國、朝鮮充滿蔑視，於是將曾經對西洋人有過的警戒和不信任完全拋棄在腦後，驟然轉向唯西洋列強馬首是瞻的「脫亞論」。實際上，近代日本對朝鮮和中國以奪取領土建立偽政府為特徵的侵略，不僅遠遠超過了西洋人的做法，而且後來還招致了西洋人普遍的反感和反對。

歷史進程證實，陶醉於一時的「望外之喜」中的日本，後來卻不得不在巨大的民族悲劇中歷練反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洋諸國就開始警惕這個從「脫亞」中走過來的東方國度並開始考慮掣肘之策。這時，不管歐洲還是美國，都不再理會福澤諭吉〈脫亞論〉文中所流露的西洋崇拜感覺。另一方面，身置日新月異的文明演進的活劇場中卻愚鈍呆滯、不能與時俱進地靈活反應的國家，就只好扮演悲情主角，其中的教訓亦是值得記取的。

福澤諭吉畢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即所謂日本的「獨立」，是對國家安全的一種設計。夾在「東」、「西」之間的日本，要完成「獨立」，必然要向「東」、「西」兩個方向尋求完成「獨立」之道。福澤的「文明入歐論」驟然向「政治脫亞論」進行轉換的原因，在於自強運動後作為巨大的「他者」中國的存在，在於中法之戰時清廷所表現的軍事實力，在於清朝在朝鮮問題上不言輕易放棄，在於包括福澤在內的日本人對中國軍事力量強化這一事實的認知並由此引發的擔心。中國一旦強大，日本便徒生猜忌，其外交政策就會向西方一側傾斜，這一近現代中日關係史上的定律，可以說正反映在福澤等人在「文明入歐論」與「東洋盟主論」的碰撞下完成「政治脫亞論」這種「文明論」邏輯構造的最終設計上。

註釋

- ① 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六十四卷，〈洋學〉，上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頁51、487。
- ② 尾藤正英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四十五卷，〈佐藤信淵〉（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448-517。
- ③ 佐藤昌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五卷，〈橫井小楠〉（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453-54。
- ④ 吉田常吉、藤田省三、西田太一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四卷，〈吉田松陰〉（東京：岩波書店，1978），頁193。
- ⑤ 福澤諭吉：《福翁自傳》（東京：講談社，1974），頁280。
- ⑥ 長尾政憲：〈福澤諭吉の政治思想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載岩生成一編：《近世の洋學と海外交渉》（東京：巖南堂書店，1979），頁349。
- ⑦ 松澤弘陽：《日本政治思想》（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3），頁26。
- ⑧ 福澤諭吉：〈還曆壽筵の演説〉，載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64），頁336。
- ⑨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收入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58）。
- ⑩ 福澤諭吉：《勸學篇》，收入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

- ① 鹿野政直：〈明治時代の思想〉，載石田一良編：《體系日本史叢書・思想史Ⅱ》，第二十三卷（東京：山川出版社，1984），頁262。
- ②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18、21-25。
- ③ 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國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頁29。
- ④⑤ 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集：《講座 日本歴史7 近代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頁305；307-12。
- ⑥ 〈鐵道の開通〉，載小西四郎編修：《寫真圖説 明治百年の歴史》，上卷（東京：講談社，1968），頁99。
- ⑦ 樋口清之：《學習日本史圖鑒》，第七卷（東京：講談社，1980），頁91。
- ⑧ 〈內國勸業博覽會〉，載《寫真圖説 明治百年の歴史》，上卷，頁137。
- ⑨ 田村明：《江戸東京まちづくり物語——生成・變動・歪み展望》（東京：時事通信社，1992），頁154。
- ⑩ 色川大吉：《新編明治精神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頁218。
- ⑪ 山縣有朋：〈進鄰邦兵備略表〉，載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頁97-98。
- ⑫ 春畝公追頌會編：《伊藤博文傳》，中卷（東京：統正社，1940），頁337-38。
- ⑬⑭⑮ 福澤諭吉：〈時事小言〉，載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頁187；187；186。
- ⑯⑰ 福澤諭吉：〈論朝鮮交際〉，載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30；31。
- ⑱ 福澤諭吉：〈敵を見て矢を作ぐべし〉，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八卷，頁309。
- ⑲ 福澤諭吉：〈兵論〉，載《福澤諭吉全集》，第五卷，頁311。
- ⑳ 福澤諭吉：〈守成は創業に異なり〉，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八卷，頁373。
- ㉑ 福澤諭吉：〈日本は支那の為に蔽われざるを期すべし〉，載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九卷（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415。
- ㉒ 福澤諭吉：〈輔車唇齒の古諺恃むに足らず〉，載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30。
- ㉓ 福澤諭吉：〈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卷，頁159。
- ㉔ 松澤弘陽：《近代日本思想史》（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3），頁42。
- ㉕ 福澤諭吉：〈軍費支弁の用意大早計ならず〉，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卷，頁156。
- ㉖ 福澤諭吉：〈脱亞論〉，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卷，頁238-40。
- ㉗ 韓東育：《從「脱儒」到「脱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387。
- ㉘ 福澤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載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61），頁491。
- ㉙ 劉岳兵：《日本近現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頁74。
- ㉚ 遠山茂樹：〈自由民權運動と大陸問題——民主主義と平和問題との歴史的考察〉，載《遠山茂樹著作集》，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80。
- ㉛ 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の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え返す》（東京：高文研，2002），頁242。
- ㉜ 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の戦争論と天皇制論》（東京：高文研，2006），頁292。